

中国劳工
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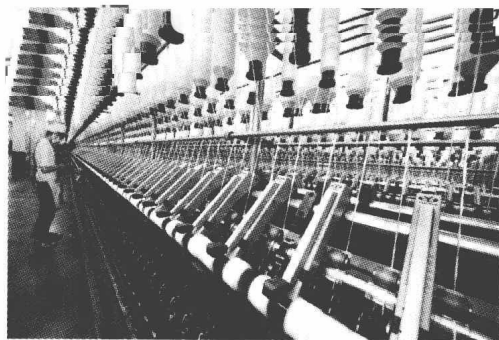
——中国纺织产业的个案研究

赵明华 著 范酉庆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劳工
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

——中国纺织产业的个案研究

赵明华 著 范酉庆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中国纺织产业的个案研究/赵明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中国劳工问题研究)
ISBN 978-7-5097-1726-4

I. ①国… II. ①赵… III. ①国有企业—纺织工业—
经济体制改革—影响—工人—研究—中国 IV.
①F426.81②D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521 号

· 中国劳工问题研究 ·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工人

著 者 / 赵明华
译 者 / 范酉庆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李延玲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项目统筹 / 周 丽 李延玲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6
版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字 数 / 66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726-4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本书源于作者 1996 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书中所记录和分析的事件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本书所关注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车间生产线上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一线生产工人所产生的压力和影响。

书中一手资料由作者使用非结构性访谈和观察法从位于中国中部的河南省的三个国有棉纺厂采集所得。工人始终为研究的主体，不过工厂经理、工会主席、政府官员等有关方面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作者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度分析，包括：工厂生产目标和作业机制重组，管理阶层利润意识的导入和强化，工人就业身份的转变，劳动纪律和劳动奖惩制度的改革，企业工会的重组，生产过程中性别分工的延续与强化，以及城市棉纺业农民工队伍的日益壮大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项研究推出的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改革中经历的变化十分有限，在劳动过程层面上，一些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劳动管理实践，如延长劳动时间、拒绝工人休假或请病假、生产线提速而减员等方法只在私企或合资企业里才会发生。然而，正如本书通过案例研究所揭示的，这些劳动管理实践和方法至少在 90 年代中期的一些国有棉纺企业中已经相当普遍。

工厂管理层通过一系列强硬措施来强化劳动过程并使之制度化，旨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所获利润，以便在不断两极分化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中应对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而工人为这些强硬措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工人在改革中经历的是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纪律的强化、由于生产条件改变所引起的健康状况的下降甚至恶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劳动生产的强烈不满。

不幸的是，这项 10 多年前完成的研究发现和今天的中国工人命运仍然密切相关。发生在 2010 年的 15 名富士康年轻工人失去生命的悲剧说明了这一点，虽然此次悲剧发生在中国的私有企业。

Theo Nichols
Emeritus Professor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Cardiff University

序 二

明华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译本即将出版，嘱我写序，这自然是义不容辞的。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近 20 年的学术交往，还因为她中西兼具学术背景的中国研究对我们有十分珍贵的启示，也因为她对劳工研究的价值观念感人至深。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她回国做纺织业工人调查，经朋友戴建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介绍，我们相识。她做的一些调查，我有所参与，也学习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方法。那时，我刚刚完成了一项中国工人和工会的研究，以《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国工会怎么办》为题出版了一本小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陈佩华（Anita Chan）博士，建议把这本小书翻译成英文，并邀请明华做翻译。明华慨然应允，在攻读博士学位学业的繁忙之中很快完成了翻译。之后，该译著（*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由陈佩华博士组织出版。在这个意义上，我后来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往，是因此而更多了起来。明华完成博士学业后，在英国的大学里从事国际海员研究，我们又与其他学术伙伴一起完成了一些中国远洋船员的调查和研究。2004 年用中英文双语出版的《海洋上的社会——中国商船政委与船员的航海生活》（*The Political Commissar and His Shipmates—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issar's Role on Chinese Ships*），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近年来，明华对中国工人调查仍然时常念及，并且做了不少想进一步开拓的努力，我们之间的学术合作还会延续。

至于明华这项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研究，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限于篇幅，我只想集中谈一点，即她做劳工研究运用的产业视角具有重要

意义，能够更好地揭示问题之所在。简言之，有着更好的问题意识。工业化以来的市场，就是改变了血缘、族缘、地缘等限制，按照业缘即产业、行业、职业等发展起来的。其中发生的劳资矛盾，包括性别、身份方面的问题，都是与业缘相关联的。在西方劳动研究中，基本的方法便是产业、行业、职业分析的方法。明华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国改革中的纺织业，是这方面的先行者。我梳理其中的脉络：纺织业劳动的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密集；劳动密集导致制造劳动廉价；劳动廉价导致使用女工、使用农民工；廉价使用女工导致性别歧视，廉价使用农民工导致身份歧视；国有企业的性别和身份的歧视性用工，导致其与私营及外企在这方面没有本质不同；问题的本质在于，政府在正确地赋予企业经营权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推卸了对劳动者应有的保障责任；这种推卸责任的失误，被层层传递以致不断扩大，导致企业、车间、班组、某些个人都可以歧视女工、歧视农民工；歧视所酿成的问题的性质，是改革设计者也难以预料的，不仅有一般的劳动问题，还有精神疾病、婚姻失和、家庭解体等严重社会问题；基本是来自农村的女工、农民工，在憧憬工业生产美好前景的时候，实际上又面临新的职业困境，“注定又要开始经历一个觉醒的过程”。当然，明华的实证描述和理论论述并非没有可挑剔之处，但是上述产业研究方法对问题揭示之深刻，理据之凿凿，是在同类其他方法研究中极少能够见到的。

“能够更好地揭示问题之所在”，或“有着更好的问题意识”，是相比较而言的。以往中国大陆的研究者更习惯于企业研究，对产业研究是生疏的。因为，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管理的基础就是行政化的企业。而以企业为基础的体制与以产业为基础的体制相比较，在利益划分、利益平衡、利益兼得等方面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前者具有“综合性”，后者具有“分利性”。综合性，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矛盾，容易遮蔽矛盾和积累矛盾；分利性，借助市场机制平衡矛盾，有利于显露矛盾和解决矛盾。当着中国企业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运用企业与产业结合的视角，是研究中必要的选择。市场中企业内部矛盾的解决，需要强化劳动者、工会在合同、协商、分利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其中，企业工会功能的转变，相关产业、行业或地域工会的介入等，都十分需要。然而，对产业工会、行业工会的介入，一些人存有疑虑。在国际工运历史的经验中，包括中国的经验中，产业或行业工会确有比较大的甚至过分的分利性。然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整体上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视不同情况调整产业、行业的功能。基本

的路向应该是，某些产业、行业的行政垄断性需要限制，其他多数产业的分散性需要整合，逐步把企业为基础的体制转型为与产业、行业或地域互动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李立三主张先建立行业工会再建立相应的企业工会，行业工会与企业工会相互制约又相互给力，比较好地引导了一些工人过激的利益诉求，使之反而得以合理实现。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已经规定，在县级以上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这都反映了这种体制转型的可能。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与企业相关的要素是越来越按照行业、产业组合和重组的。比如，区分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区分垄断产业与非垄断产业、区分需要扶持的产业或行业与需要限制的产业或行业等。有些国家按照产业、行业制订涉及劳工权益的法律，诸如《邮政改革法》、《铁路民营化法》、《新兴产业促进法》等，是值得借鉴的。

由于多年相处，我感到，明华本人的问题意识有着明显的价值观念做基础。这是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向，是以劳工为本位的，是相对稳定的。我们是在做社会实证调查中相识的，之后又很多次地讨论社会实证调查事项。而通常，学界往往强调从事这种调查需要“价值中立”。我记得，明华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多次颇为激动地争辩或阐述“没有什么价值中立”，“特别是做劳工研究就更没有什么价值中立”。后来，我与她的英国导师以及其他与她共事的学者们相识，才了解到那多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其中，Theo教授、Tony教授等，与我年龄相仿或比我略大，对上个世纪60年代记忆犹新，乃至参与过实际的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当着那些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沉寂后，他们归隐于大学，甚至成为知名的学者，但信念和追求却未曾改变。与他们相处，使我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也安然享受一份恬适的欣慰。明华身上有他们的遗风，从她在纺织企业调查之深入和细微，就可以感受到。后来，她做远洋船员的研究，一直想随船远航以亲自体验，因性别问题而一再受阻，但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还知道，她自己遇到了权益问题，是学校的工会伸出援手，事情摆平后她感动不已，且念念不忘劳工组织之力量。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她是怎样在纺织行业维护工人的权益呢？她曾经发现和培养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是唯一拒绝“永远开除”刘少奇的中

央委员。她在工会工作中表现出活动家的风范。像敢于陈情。1950年3月，陈少敏给刘少奇、陈云、李立三写报告，反映工人的劳动条件比农民高得多，但吸收的新鲜空气、吃的新鲜粮食比农民少得多，所以生病的也比农民多。建议将国营厂生产计划外的盈余部分，抽一定比例拨交各地纺织管理局，用于给工人发奖金，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扩大生活福利设施。她的建议很快被采纳，兴建了规格较高的医院、疗养院，各纺织厂增建了食堂、浴室、托儿所、业余学校、俱乐部等福利设施。像善于解难。1950年7月，陈少敏在青岛检查工作时，发现因天气炎热，许多纺织厂都发生了工人在车间晕倒的事故。她做通了技术员的工作，又多方联系解决经费问题，终于攻克了高温高湿的大难题。织布车间温度从摄氏40度下降到摄氏29度多一点，相对湿度也降低了，工人们干活觉得舒服多了，产品质量也没有受到影响。在全国纺织工会的推动下，这个降温措施在全国迅速推广，大大改善了纺织工人的劳动条件。像伸张正义。解放初期，工厂还保留了很多不合理的旧制度，出现了不少损害工人利益的事情，像锅炉爆炸事故、工头强奸女工、工人晕倒在车间、孕妇在车间流产等。对此，陈少敏都亲自或派工作组去认真调查处理。1950年8月，天津中纺一厂工人张连舫因为受到工头的欺负，找行政和工会反映意见，但没有人给予解决，就投水自尽了。为了让各方面都吸取教训，引以为戒，陈少敏主张大张旗鼓地严肃处理这件事。报纸公布了这件事的经过和处理结果以及天津中纺一厂军代表和工会主席的检讨。

当着我们从一种产业或行业的视角洞悉了其中严重问题之所在后，多么需要陈少敏这样的工会活动家啊！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尚且能够产生这样的活动家，现在不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活动家吗？2003年，全国总工会就提出了造就工会活动家的号召，在纺织行业也是呼唤着当代的陈少敏。2010年，河南纺织行业发生的平棉集团老工人静坐事件，被地方警力驱散，工会主席却自始至终没有踪影，事后市委领导对错误处置深感愧疚。据近年来对纺织工人现状的调查，一些国有纺织企业仍然没有改变明华将近20年前观察到的问题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一些内地省份的国有纺织企业与当地的民营纺织工厂相比，生产经营状况不如人家，工人待遇则更差。针对纺织工人收入偏低这一现状，有的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长时间深入调研，建议给纺织工人加薪，旨在使这些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能有所改善。如果从行业视角考虑，纺织工会需要系统地了解问题之所在，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这就要深入工人中，而且要树立问题意识，还应该践行建设性思维。其实，从明华的著述中也能够了解到，工人也是充满智慧的。比如，为了解决替班问题，她们想出了“买班”的办法；为了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她们想出了“卖工作”的办法；当着企业希望用精神激励工人时，在工人意愿的推动下，工会则强调物质激励的作用，明华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开展工资协商和集体谈判的萌芽等。如果中国的纺织工人能够幸遇当代陈少敏，有这样的工会和工会主席，相关的劳动社会问题就会得到较好解决。

冯同庆

2011 年秋于北京花园村

序 三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关系扑朔迷离，复杂多变，充满紧张。“劳动关系怎么了？”“劳动关系为什么？”“劳动关系怎么办？”这些既考验着学者的智慧，也考验着企业的管理理念、工会的定向知识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感谢作者的信任，让我早于其他读者阅读了这本著作。我逐字逐句读过之后，相信它包含了对中国劳工和劳动关系问题的浓厚关切，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对原因的透彻解读，对症结的准确指认，还有对解决思路的明确启迪。简言之，它触及了“怎么了”、“为什么”、“怎么办”等急迫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迄今依然是劳动关系解释的基石。私有制、市场制是其理论的基点。企业所有者借助生产资料主宰了雇佣权力，以市场方式获得对劳动力的使用权，以使用权严密控制劳动过程，借此让劳动者生产出超出其工资报酬数额的剩余价值。然而从劳动者的立场看，这种劳动过程控制起码给他们造成了五个方面的不利结果：（1）就业的灵活性、不稳定和失业的生存威胁；（2）劳动的高强度、长时间和过度疲劳、健康损伤、精神疾患；（3）劳动条件的恶劣、劳动保护的缺乏和工伤、职业病的缠绕；（4）劳动纪律的苛刻、劳动管理的强制和劳动者尊严、体面、自由的丧失；（5）工资的低水平和工人的贫困化。马克思指出，决定企业的劳动控制行为的，一是资本的本性，二是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市场竞争越是激烈，这五个方面的结果就越明显。

作者所面对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对工人的影响，与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同还是异？早在作者写作本书之前，

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市场”不同于欧美的“市场”，中国国有企业的本性不同于私人部门，所以，中国国有企业劳动者的市场后果也不同于西方。本书则以十分翔实的调查资料和以科学方法支持的洞察发现，市场所导致的劳动过程控制和劳动者后果，在性质上并无多大的国别不同。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使“管理层对利润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这“导致了企业权力结构的重构”、“劳动过程的重组”，“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让工人处于不利的境地。简言之，只要进入市场体制，企业就遵循类似的逻辑。无论私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劳动过程控制的逻辑和劳动者后果基本相同。如果说存在差异的话，那多是表现在程度上。中国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劳动关系演进，实质上是一个市场力量逐渐展现、劳动过程控制逐渐增强的过程。作者在中国市场经济初期（20个世纪90年代）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其实现在依然如此，只是程度更为深化、表现更为突出而已。从这个角度，本书可被认为是以马克思劳动过程视角剖析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劳动关系的先行之作和创新之作。

作者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做了分析。这是她与马克思、与欧美研究者有所不同的地方，也是其发现的独到之处。作为国有企业，它不能不接受政府直接的行政控制，一是政府主管部门对经营者的任命，二是党政部门和官方工会对企业工会的领导。这两个制度安排都影响到劳动过程控制与劳动者处境。被任命的经营者不能不服从政府制定的政策和下达的任务，当政府强调利润指标时，加强劳动过程控制；当政府强调社会稳定指标时，减轻对工人的控制。企业工会一方面服从政府和企业的效率目标而在劳动过程控制上支持管理层，另一方面服从政府和企业的稳定目标，作为工人的代表者平息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冲突。

作者揭示，行政控制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影响性质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为企业的劳动过程控制设定了一条时而存在的底线，一旦超出底线、工人以行动表达不满就进行干预；另一方面，它让工人们始终处于原子化状态，在劳动过程控制面前束手无策，茫无所依，不具备“反超限控制”的能力。只有政府照章执法，它才有权利；只有政府提高标准，它才有改善。无论在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工人在其中都无可用以自我保护的力量。原子化状态放大了市场和劳动过程控制对于工人五个作用。本书所描述工人状态和感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这里的工人与西方国家可以自由组织工会的工人相比的无助和无奈。

当回顾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作者的观点对于新中国成立前（1840 ~ 1949 年）中国的劳动关系也有相当大的解析力。1840 年以后，由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劳动过程被雇主严密和严酷控制，非市场的封建力量和官僚力量则促进着劳动者的“超市场化”和工人的“原子化”。“市场”宛如一场暴雨，“劳动过程控制”宛如猛爆的山洪，没有规范的河道，没有堤坝的阻拦，随意横行蔓延。工人们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不久，“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工人们“起来”了。历史所表明的是，企业单向性的劳动过程控制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的劳动关系同时需要劳动者群体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过程控制应该双向互动、合理平衡。

解释是为了对策。作者无疑提示了中国劳动关系调节的某些路径和政策。既然市场制度是一把超越时空的“双刃剑”，既然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进程中创造了一系列平衡劳动过程控制的方法，从而实现了产业和平，那么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些办法来解决中国的劳动过程控制问题。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我们就应该针对中国问题、中国逻辑、中国症结，提出自己的创新性的平衡劳动过程控制的措施，例如，应该如何改革政府对企业的行政控制。

作者似乎提出了对策的关键点：“谁能够代表企业工人的权益？”或者说，“谁来平衡企业管理方的超劳动过程控制？”这个问题与波兰尼所提出的必须在市场过程中“重建社会”有关：“企业内的社会主体是谁？”也与布洛维所提出的以“企业内部国家”实现劳动关系的成功调节有关：“这个内部国家以谁为主体？”作者对此的回答是明确的，答案已经在本书中了。

石秀印

2011 年 9 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

自序

本书是研究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工厂和工人的一本学术专著。本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从工业社会学的角度深入了解中国工人在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感受，研究重点是工人就业特别是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工厂生产、生活的变化对工人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本书的主要时间框架是国有企业剧烈变革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具体研究对象是国有企业纺织工人。

以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和资料查询为主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河南省的三个大型国有棉纺厂完成。访谈对象虽然也包括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干部、工厂管理层、工会及其他部门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研究的主体是一线的生产工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笔者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使用这些资料时，笔者着重于资料的定性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的生产目的以及操作机制的重新定义和重新组织；工人就业、工作乃至生产等劳动过程内涵的变化；生产纪律和劳动报酬的改变；企业工会的重组；生产线上性别分工的刚性延续；农民工大量参与工厂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和挑战等。所有这些由于改革而产生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对工厂生产、劳动乃至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感受。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从生产线工人的角度分析研究企业内部的权力变迁和运行是本书的特色。本书是在笔者博士论文（英国 BRISTOL 大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笔者基于该毕业论文的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曾在西方学术刊物和有关中国工人研究的专著中出版发表，颇受关注。

本书的研究虽然是在十几年前国有企业改革激变时进行的，但是其中深入描述和分析的中国工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和挑战，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劳资纠纷日益尖锐的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笔者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劳工研究特别是研究理论和方法作出有益的贡献，也希望能为中国社会科学乃至历史专业（特别是劳工史专业）的学者、学生以及其他对中国当代劳工问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提供一本具有现实和历史参考价值的书。

为了保持这段中国工人历史的原貌，笔者有意保留了论文写作时所使用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其实，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十几年实在是短暂的一瞬！在当今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企业改革还在继续，“资本”、“国家”和“劳工”的博弈依然“正在进行”！

赵明华

致 谢

15年前，我结束了在英国 Bristol 大学的研究，提交了题为 *The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Labour: Cases from State Cotton Mills* 的博士论文。15年后，当年的论文现在能够以中英双语出版成书，我深感荣幸。在这本书的背后，有许多无私地帮助、支持过我进行学习研究的人们的心血和期待，借此机会，对他们致以衷心感谢。首先感谢美国的 Rosenthal 夫妇、Marl 夫妇和 Margaret Dickeman 教授。他们的慷慨资助和帮助使我获得了 1990 年到美国学习社会学的机会。感谢英国 Bristol 大学和英国教育部 ORS 项目为我在英国的三年学习所提供的全额奖学金，以及 Great Britain - China Centre 所提供的进行田野调查方面的资助，这些在经济上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得以全心投入研究。感谢我的两位导师 Theo Nichols 教授和 Jackie West 女士，感谢他们二位在我留学英国期间，在学术上对我的无私帮助和在生活上对我和我的家庭的不尽关怀。Theo 和 Jackie 是我的终生良师益友，他们正直忠诚、为人师表的风范一直在影响着我，使我后来在指导自己的学生时要求自己尽职尽责，丝毫不敢懈怠。感谢北京市社科院的戴建中教授，是他介绍我认识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冯同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石秀印教授以及其他中国劳工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项以及我后来的其他研究中都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帮助。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范西庆先生，他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和对中国劳工状况的了解、把握是本书中文版得以成功的关键。感谢伦敦的同事 Felipe Poleo 先生和 Suzanne Louail 女士，他们在我准备英文书稿时给予了很大帮助。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提供经费，使这本专著得以出版。感谢北京劳工中心的赵炜博士，她在帮助联系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方面给予了极其宝贵的帮助。这本书是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周丽、李延玲两位老师的直接

鼓励与支持下作为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编辑出版的。她们对工人问题研究的热情关注，对作者的理解、耐心和宽容，使我永远心存感激。特别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和先生，特别是我的儿子——虎子，他们在我离开中国的那些岁月里，忍受了巨大的离别之苦，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们的爱和关怀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得以在“异国他乡”坚持下去没有动摇。最后，最值得感谢的是那些在百忙中接受过我的访谈的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领导、工会干部，特别是那些生产一线的纺织工人，他们的支持是此书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我愿意以此书献给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作出巨大牺牲的中国纺织工人！

赵明华

2012年4月20日定稿于挪威 KRISTIANSAND 大学